

欧洲安全组织

与

安全结构

朱立群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欧洲安全组织与 --- 安全结构

朱立群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安全组织与安全结构/朱立群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4

ISBN 7-5012-1709-2

I. 欧… II. 朱… III. ①国家安全—研究—欧洲②国际政治—研究 IV. D75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096 号

欧洲安全组织与安全结构 OuZhou AnQuan ZuZhi Yu AnQuan JieGou

责任编辑 / 吴健生

封面设计 / 孙 旻

责任校对 / 戴文达

责任出版 / 王勇刚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 / 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010) 65265923

邮政编码 / 10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 /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北京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印张 / 850×1168 1/32 9½印张 246 千字

版 次 /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

谢

《欧洲安全组织与安全结构》一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完成的。这项研究从选题到最后定稿共用了近三年的时间。这三年里，本人受到国内外师长和学友的热忱帮助，并得到有关机构组织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以下组织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导师周启朋教授对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她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专心治学的态度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没有她的悉心指导和全力支持，我的博士论文以及本书的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

感谢首都师范大学的齐世荣教授，他在百忙之中对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任教期间聆听过先生《史学研究方法》和《现代国际关系重要著作选读》两门课程，并在具体研究中获先生的指导，他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精神令人难忘。

感谢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和林军教授，他们对我研究大纲提出的详细书面意见，始终指导着我的整个研究与写作过程。感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苏格研究员和宋以敏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冯仲平研究员和刘海如研究员，外交学院的曲星教授、周尊南教授、宫少朋教授，赵怀普副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刘纬副编审，他们都先后参与了对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和评审，提出了非常中肯的修改建议，并鼓励我将其修订成

书。感谢社科院的王建娥博士，与她就世界体系和世界历史问题的多次深谈，使我深受启发。当然，本书中存在的问题与诸位老师和学友没有关系。

感谢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里奥特国际事务学院亚洲国际关系研究促进会为我提供的赴美机会，使我有机会广泛搜集资料，并访谈了华盛顿特区诸多研究机构的学者。

感谢欧盟中国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为我提供的赴欧研究机会和资助。感谢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让·莫内教授默克森-布朗（Edward Moxon-Browne）先生、欧亚研究中心主任、让·莫内教授奥卡拉汗（Bernadette Andreosso O'Callahan）女士和研究生院主任里斯（Nicholas Rees）教授为我提供的各种研究条件和研讨机会，正是他们的热心帮助使我得以在爱尔兰期间完成本书的部分写作。感谢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政治系主任、让·莫内教授阿迪纳（Fulvio Attina）先生，他邀请我参加的欧洲与亚太地区安全问题让·莫内研讨会，使我有机会接触欧洲安全问题专家，并就很多问题求教于他们。

感谢外交学院领导与学术委员会对学术著作一如既往的支持，本书获得的出版资助使其能够顺利出版。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吴健生先生的大力协助，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动。

感谢我的亲人们，他们给予我巨大的精神支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贺弘景先生，他宽厚的理解，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他作为第一读者对本书的首肯，使我有勇气将书稿交给出版社。感谢女儿小雨，她的懂事和省心使我可以专心研究与写作。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他们对我的谆谆教导和言传身教，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工作。

朱立群

2001年9月于北京

前 言

任何一次历史巨变，都会带来国际秩序的重建。每一次新的国际秩序建设，都是继往开来，在旧有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现实环境有所创新。用基辛格的话说，“世界新秩序，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①

大规模战争往往导致旧秩序的崩溃，新秩序的诞生。每一次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工作，一般都是围绕着对战败国的处理确立起一个条约体系，并靠着这个条约体系支撑起新的国际秩序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国际关系的互动方式、以及国际秩序的运行原则和发展方向都将被确定下来，新秩序因此而形成。

1990年前后，以东欧转制、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为主要特征的历史巨变，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45年之久的雅尔塔体系的终结。欧洲两极体制的瓦解，虽非大规模战争所致，但其变化的深刻性和影响的广泛性，并不亚于一次全面战争导致的结果。冷战结束之后，欧洲面临的艰巨任务正是秩序的重建。

一、本书研究的问题及其意义

任何一次国际系统的根本变化，都会导致新秩序的诞生。每

一个新的秩序，都会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结构特征，结构支撑着秩序，是秩序的框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体系是围绕着凡尔赛条约体系建立起来的，它的安全结构明显地表现为集体安全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突出地表现为两极对峙的结构。那么，冷战结束后，欧洲的安全结构是怎样的呢？其突出特征是什么？为什么出现了这样而非那样的安全结构？建立在这种安全结构上的欧洲新秩序是否稳定？这是本书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

本书研究的是欧洲地区的安全结构建设，结构建设的单元以欧洲地区的安全组织为主，如北约、欧盟/西欧联盟和欧安组织，兼及有影响力的主权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地区尤其是西欧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一体化和组织化的地区，与亚洲地区的相对分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安全的角度说，欧洲地区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使地区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地区协调和所谓“安全的不可分性”成为地区安全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安全问题的多边主义反应成为各个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选择，安全组织正是这种多边主义的重要工具。安全上的多边主义反应，使得安全组织研究在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的讨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在欧洲地区，结构的单元很难再单纯以西欧单个国家作为考察对象，主权国家对结构建设的参与是一部分，组织的参与较之单个国家的参与程度并不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主权国家。因此，本书的研究主要是透过冷战后欧洲地区安全组织的变化研究欧洲安全结构的变化，因而这项研究不仅仅是欧洲地区安全组织的研究，还是冷战后欧洲地区安全结构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探讨和分析地区安全组织的变化揭示冷战后欧洲新的安全结构和秩序。

本书将主要研究欧洲地区三大安全组织在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里所进行的内部调整和改造，尤其是职责和任务的重新确

定，战略目标与手段的调整，以及这种调整对组织力量的影响和给组织带来的变化。研究欧洲各种力量在各个安全组织中的利益、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特别是冷战后的欧美大西洋联盟关系的演变，并从组织力量研究中揭示各安全组织在欧洲新安全结构中的地位 and 作用，新安全结构的形成、特点、控制机制、运行原则与方式等。本书力图展示冷战后欧洲各安全组织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欧洲安全结构的影响，以及新安全结构的特征、形成原因、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对地区秩序的影响。

本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第一，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研究旨在揭示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中新的力量结构和特征，以及这种新结构的控制机制和运行方式。这一研究目标决定了本课题研究为系统层次上的分析。系统层次的研究重点在于揭示系统结构，即系统中各行为体之间的相对权力地位，它是指一系列影响行为体的约束性环境。系统层次上的宏观分析，其重要性表现在，它通过指出体系的持久性和稳定与否来“探索不同的国际体系的未来发展”，并“说明系统的结构如何影响相互作用的单元，以及后者如何反过来影响结构”。^②也就是说，系统层次上的分析，由于重视结构的研究，可以使我们集中观察影响行为体的系统性力量，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系统的功能和系统的稳定与否。“系统的视角可以使人们在看待国家安全问题时前瞻后顾，视野更加广阔。它有助于确认一些诸如密度、极、国家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性质等因素，这些因素减缓了无政府状态。”^③因而，系统分析具有全局性和概括性，对于各单元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究竟形成了怎样的力量结构，这种结构对各个国家行为的影响如何，对全球国际关系的影响如何，这些重大问题的解释既可使我们深入了解冷战后欧洲的变化，又可以使我们透过欧洲了解整个世界的形势，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正是由此体现出来。

第二，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的建设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并带

有自己的特点。20 世纪以来,欧洲安全秩序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前两次分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第三次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冷战是在和平条件下结束的,冷战的结束又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飞速发展,因此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的建设带有不同以往的特征。一方面,它不是通过战胜国强制性条约体系的建立而形成,而是表现为一个较长时间的渐进过程,并带有较强的继承性;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和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权力的内涵和权力的转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而结构建设过程中的行为体因素和安全的内涵较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欧洲安全结构建设过程中,权力、规范和危机三大因素交互作用,互相影响。从动态过程中分析这些因素对欧洲各主要安全组织的影响,并通过这些安全组织的变化探讨欧洲的安全结构,有助于我们掌握冷战后欧洲各主要安全组织的演变过程,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结构形成的影响。特别是它可以使我们从中更好地把握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掌握霸权主义的一些新特点。

第三,从安全组织的适应性改造和演变的角度研究地区安全结构,是从欧洲地区的特点出发。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冷战后欧洲安全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视,尤其是对北约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对于整体结构性研究、特别是对欧洲各主要安全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较少,本书力图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整体结构研究的重视,同时也在立场、观点、理论指导和结论上区别于国外的研究。

第四,由于这项研究涉及冷战后欧洲各种主要安全组织的发展演变,涉及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欧盟、俄罗斯、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战略与构想,特别是涉及美国的欧洲战略以及美欧关系问题,新的结构特征和未来趋势,因而这项研究对于观察冷战后国际格局以及各种主要力量的发展演变具有现实意义。

二、美欧学者对欧洲安全结构的研究

在展开本课题研究前，了解一下国外学术界对欧洲安全结构建设的对策建议以及研究现状是必要的，这里主要介绍美国和欧洲学者的有关研究的主要观点。

美国学术界对欧洲安全结构建设以及美欧安全关系的研究大都是与对策建议和前景预测结合在一起的。这些研究从理论流派上大致可分属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意见认为，冷战结束后，欧洲将从两极结构重回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多极结构，并使欧洲陷入动乱和不稳定之中。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现实主义流派的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他在“为什么我们会很快怀念冷战”以及“国际制度的虚假前景”等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批判了自由主义关于欧洲结构的论述，讨论了欧洲新秩序的多极前景，并提出了核武器有可能扩散到德国，以及如何设法维持多极力量平衡的办法。肯尼斯·沃尔兹更提出，冷战结束后北约存在的时间虽然不是以日计算，也只不过是以年计算而已。^④

第二种观点属于新孤立主义，他们强调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没有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欧洲也不存在可预见的威胁，美国处在前所未有的安全环境之中。因此，美国应该从欧洲撤离，远离欧洲的冲突和战争。传统的军事联盟应该解散，国际组织只是个清谈馆，不能解决维护和平的问题，因此，北约可以留给欧洲人去建设，欧洲的冲突是欧洲人自己的事情，而不应由美国人去解决。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布坎南、伊尔·拉沃奈尔和埃里克·诺德林格等。^⑤

第三种观点认为，冷战后的美国在欧洲拥有绝对的优势地

位，可以承担外交政策的任何需要和任何选择，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目标应是保持美国的这种优势地位，而对美国在欧洲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是可能重新崛起的俄罗斯，因此，美国在欧洲应实行经过修正的新遏制政策，这包括北约应快速东扩至俄罗斯的门口，美国对地区冲突的政策应从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和处理。这种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布热津斯基、基辛格、杰殊瓦·穆拉维什克以及兰德公司的一些重要学者。^⑥

以上三种观点是现实主义的代表观点，它们都是从力量关系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问题，是地缘战略和势力均衡战略原则在冷战结束后的运用。它们共同的缺点是以美国为中心，对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和结构建设过程中欧洲力量以及欧洲国家发展自身防务合作的因素重视不够。

第四种观点认为，欧洲应建立一个法制化的合作安全体系，这个安全体系的出发点是欧洲存在着战略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各种信任措施、军控条约和核查机制为合作安全提供了广泛发展的基础。冷战结束后欧洲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地方冲突，因而军控和防止核扩散，以及预防冲突和军事干预冲突是合作安全关注的重点。他们认为，欧洲应进一步将既有成果深化和向东扩展，北约承担着建立合作安全网络的使命。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威廉·佩里、阿什通·卡特、约翰·斯坦布鲁诺等。^⑦

第五种观点认为，美国虽然正处在优势地位，但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必定导致美国力量的衰弱。美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利用权力的优势地位，做一个建构世界秩序的“善意”霸权国。善意的霸权国通过自我约束和发挥多边机制的作用，通过谈判和引导而不是强制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种中心和外围的体制，也即“善意单极体制”。这种等级结构，再加上霸主的善意是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在地区范围内，美国则应该鼓励地区主义，建立北美、欧洲和亚洲各地区的中心和外围体制。在欧洲美国应鼓励法

德轴心继续发挥中心作用，由法德轴心充当地区善意霸主，吸引欧洲小国接受中心的领导并保持与中心的协作，从而可以建立起欧洲稳定的秩序。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查尔斯·库普钱等。^⑧

第六种观点认为，冷战的结束为欧洲建立民主国家的安全共同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在欧洲，安全上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已经形成，建立在共识和磋商基础上的大西洋关系稳固，开放的经济秩序使各国可以从中获取绝对收益而不必担心地位变化导致的不安全，西方共享的价值观与各国政治精英对西方国家合作关系的政治共识，使西方国家间的政治规范得以遵守，并带来政治上的稳定。冷战结束后，美国应进一步强化制度和规范的建设，进一步培育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制度可以避免安全困境，带来稳固的安全合作，使欧洲长久地保持和平。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约翰·埃肯伯瑞和达尼埃尔·德尤尼等。^⑨

以上各种意见代表了自由主义的观点。他们强调战略上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强调民主政体与和平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制度、规范、共识对安全的影响。他们并非否认力量关系上的不对称性，但是认为力量关系的不对称恰恰是建立某种安全结构的基础。他们都认为美国的优势力量为美国创造安全结构提供了领导条件，而自由、民主、开放的美国决定了美国是善意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因而美国建立和主导的安全结构是合法的。他们对西方各种力量在安全结构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和斗争重视不够，很少涉及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在安全领域的表现。

美国学者对欧洲安全秩序的研究，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观点，表现出来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各派都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考虑的是如何利用美国的力量优势、维持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霸权利益，在这一点上各派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关于手段的运用和实现方法上有分歧。

欧洲学者对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建设的学术研究依据讨论的重点不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冷战结束之初,讨论主要围绕着以哪一个欧洲安全组织为核心构建欧洲安全新秩序的问题,各种选择方案从北约消亡到北约成为世界警察、从建立替代北约的欧洲军队到全面解除欧洲的武装建立和平民主“公民的欧洲”,不一而足。第二阶段基本上从1995年开始,讨论的重点转向检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以及跨大西洋安全关系建设与北约的改革和战略调整等具体的问题。

在第一阶段的讨论中,出现了四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欧洲安全秩序应围绕着欧共体/西欧联盟为中心建立起来。他们指出,冷战的结束,为欧洲发展自己独立的安全与防务体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欧共体应抓住机会,在完善统一大市场,发展经货联盟的同时,抓紧建设包括一项共同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在内的政治联盟。西欧联盟应与欧共体合并,从而使西欧能够真正成为世界力量中的一极。这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为当时任欧共体执委会主席的雅克·德洛尔,^⑩它基本上也反映了当时法国、意大利等政府的官方立场。在第一种意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里·布赞和奥尔·韦弗等哥本哈根学派学者的观点。他们突出强调欧共体的“软安全”作用,认为冷战后的欧洲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一体化和分散化,为了避免分散化给欧洲安全带来的破坏性作用,应进一步加强欧洲的一体化建设,使欧共体成为凝聚欧洲的中心。^⑪

第二种意见倾向以北约为中心建构欧洲安全秩序,即建立“大西洋主义的”欧洲。这种意见认为,尽管欧洲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北约的重要性一如既往。北约不仅为美国与西欧的防务联系提供了不可取代的机制,而且是跨大西洋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合作的基础。鉴于俄罗斯发展方向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以及德国统一引发的欧洲其他国家的猜疑和不安,

北约的传统功能并未因欧洲的变化而完全消失，北约经过调整和改造应该继续成为欧洲安全秩序的核心。这一派意见在英国、荷兰和葡萄牙官方，以及带有保守倾向的政党派别和学者中比较流行。^⑫

第三种意见主张建立以欧安会为基础的泛欧集体安全体系。这种意见主要是在冷战结束之初北约面临生存危机，中东欧急切寻求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产生的，持续的时间相对上两种观点来说比较短暂，并且不是主流观点。这种意见认为，随着欧洲分裂的结束，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为欧洲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泛欧安全合作的基础，它囊括的国家最多，处理的安全问题从裁减军备到人权的维护，涉及范围广泛。在欧安会进一步机构化和组织化以后，它还将为预防冲突、危机处理、和平解决争端提供各种有效的机制。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为前德国外长根舍和欧洲的许多中左派政治力量。^⑬与这一派意见有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一种观点认为，欧安会可以为建设泛欧安全共同体提供基础。他们强调安全的界定应以人的解放为前提，人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对安全的关注不仅应包括安全的具体问题，而且还应包括导致安全问题的原因。因此，各国的安全一方面与整个欧洲的安全联系在一起，另外还与各国的政治、经济运作体系联系在一起。欧安会恰好在不同的“篮子”里，在国家和个人层面的安全之间架起了桥梁，为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合适的框架。这种意见反映了冷战后欧洲安全概念的深刻变化，代表“第三条道路”在安全问题上的新思潮。^⑭

1995年后，随着欧洲安全形势的发展，尤其波黑危机解决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欧洲各国对欧洲安全秩序的讨论逐渐深入，重点转向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深入总结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得失教训；第二，探讨北约的内部改革和跨大西洋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尽管有学者认为，欧盟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外交和安全力量，^⑮但占主流地位的讨论集中在探讨欧盟共同外交

和安全政策的局限性上,认为欧盟政策实践准备不足,言多行少,缺乏一致性和可信性,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⑩欧洲学者在总结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局限性的同时,加强了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探讨,尤其是提出了稳固大西洋关系的种种设想,^⑪强调美国继续留在欧洲的重要性。^⑫与此同时,也对美国倚仗优势地位大搞单边主义的行为深表忧虑,担心美欧安全利益上的矛盾有可能导致大西洋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并最终损害欧洲的利益。^⑬尽管大多数欧洲学者支持欧盟、北约双双东扩,但也有学者强调,和平的关键是正确对待失败者。没有对东欧和俄罗斯的善意理解,90年代从安全的角度说将是一个失去的十年。因此,欧盟东扩而不是北约东扩才是欧洲安全秩序建设的稳妥途径。^⑭

欧洲学者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总结欧盟自身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实施及其经验教训,侧重探讨冷战后新出现的非战略性安全问题,诸如,大量涌向欧洲的外来移民带来的社会认同问题,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安全问题;巴尔干地区不稳定引发的关于欧洲地区维和与人道主义救援问题等等。在欧洲安全秩序问题上的争论主要涉及如何处理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问题,许多方面表现为政策取向上的争论,而不是学术分析。

俄罗斯关于欧洲安全结构建设的观点带有特殊性,其主要表现在这种讨论与俄罗斯对外政策以及俄未来发展方向等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争论联系在一起,中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如果进行简单地划分,可区分为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两大派:

大西洋主义者以俄前外交部长科济列夫为主要代表。科济列夫认为俄的外交政策应该有助于国内政治经济的改革,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都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实行一种能够把俄纳入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中去的政策。这是因为贸易的增长可以给俄带来长期好处,从短期看,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外援帮助俄渡过困难时期。为此,科济列夫一派主张在外交政策上安抚西

方国家，追随西方，与西方合作为主。他在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的“俄罗斯，生存机遇”一文中安抚西方道：“戈尔巴乔夫仅仅试图改造共产主义，而叶利钦则推翻了共产主义，因此西方不必担心其对俄罗斯的援助会被用来重建一个已经失败了的压迫人的共产主义体系。”^①

科济列夫的观点在俄外交政策的辩论中一直占据上风，但是，到1992年年底后出现了新的变化。1993年3月底，叶利钦的外交政策顾问斯坦科维奇在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全面批评科济列夫关于西方第一战略的文章。他主张俄应把战略的重点放在俄的近邻、第三世界、特别是中东、西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斯坦科维奇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争论，有人称他点燃了俄罗斯几百年来关于西方第一还是斯拉夫主义第一的传统论题。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解体引起的俄罗斯社会和思想上的深刻反思，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上的选择对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斯坦科维奇本人并非拒绝西方文化，也反对重新走扩张主义的老路，相反他支持改革，认为忽视西方并不符合俄罗斯的根本利益。

1992年后，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影响到外交政策方面就是主张欧亚并重的欧亚主义的观点开始压倒科济列夫的观点。这一派对西方俄罗斯政策的动机持怀疑态度，认为西方正在别有用心地利用俄暂时困难时期，破坏俄经济政治利益，加强其在全世界的战略地位，强化其全球统治。因此俄罗斯应该寻求重建其国防和军事力量，重振其大国地位。1993年发表的俄外交政策概念文件和同年秋天发表的俄军事指导思想都反映了欧亚主义的观点。^②由于俄罗斯地位的严重削弱，俄对欧洲安全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与政策上怎样最大限度地摆脱边缘化地位联系在一起。

三、本书的基本观点

在对冷战后欧洲三个主要安全组织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之后,本书提出的基本观点为,经过10年的发展演变,欧洲已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合中心圆结构(Comprehensive Concentric Circle Structure)(见书后图示1)。这一结构已相对稳定,但仍然在继续发展演变当中。冷战结束以后,欧洲各种力量包括国家行为体和区域安全组织行为体经过反复较量,各种安全组织经历了一个调整、适应和创新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以北约、欧盟为核心的中心圆结构。在这个安全结构中,美国领导的北约是欧洲安全的核心组织,是欧洲安全秩序的控制中心,掌握着秩序的运行方式和规则。与此平行存在着另一个核心,即以欧盟为主的安全核心,它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形成的巨大内聚力,日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安全作用,其在共同安全与共同防务方面的不懈努力,也使它朝着一个政治安全组织的方向不断发展。这两个核心既相互重合又有所不同,其重合部分表明两者的战略利益一致,二者可以合二为一;其不同之处,在于职责分工不同,各自承担不同的安全任务。北约中心圆(见书后图示2)认为,由于北大西洋联盟是一个军事政治联盟,其在欧洲安全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以军事安全为主。而欧盟中心圆(见书后图示3)认为,由于其经济一体化的独特发展和内部的高度稳定,其作为安全中心的功能主要是从“软安全”的角度体现出来,即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作为一个“安全锚地”在欧洲安全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两个核心的矛盾和斗争则预示着秩序的变化所在及发展方向,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重点。这两个职责不同的安全核心,其内部关系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聚合程度高,稳定性强。核心通过各种制度化的机制联系着核心周边的国